

25.04

玉溪市文史资料

第五辑

89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委员会

玉溪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史开福

副 主 任 冯述典 刘宝贤

委 员 张凤翔 杨宗迪 杨开运 李文彦 曾庆延
马云龙

《玉溪市文史资料编辑室》

主 编 李文彦

副 主 编 冯述典

责 任 编 辑 王德洋 刘宝贤 曾庆延 罗启运 马云龙

编 务 冯则恭 张峻君

文史工作人员 何万德（北城镇） 赖士明（研和镇）

普仕雄（洛河乡）

目 录

怀念郑一斋先生·····	聂叙伦 (1)
郑先生墓碑·····	胡光炜 (17)
我所认识的洛汀同志·····	陈雨田 (19)
徐永静简介·····	宋德功 (21)
柴家驊传略·····	柴信忠 王德菴 (23)
董灏生平事略·····	李正富整理 赵斯聪校对 (26)
甜蜜的回忆 殷切的希望·····	申丽珠 (33)
滇剧生角周锦堂·····	马云龙 周汝林 (40)
忆薛国兴同志·····	杨炯明 (43)
忆能工巧匠刘本材·····	吴芝润 (48)
以死抗暴的教师——卢家珍·····	陈德禄 (50)
忆母校——玉溪简师·····	郭绍春 (54)
锅西甸事件，棚本武工队对敌斗争始末·····	李 宽 (62)
我在玉溪民众自卫三中队的活动·····	张世雄 (68)
宝臣号和景明号简介·····	邓士贤 (75)
德茂衣庄——德茂之“茂”的回思 ·····	蔡俊德 蔡鑑远 蔡伯芬 (79)
“保和园”束记酱油创业史·····	束惠芬等 (86)
后裕乡尹家马帮·····	尹秉义 (89)

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形式·····	赵其学(99)
飞井海水库之“始”·····	廖振声(103)
“干南方”的巨变·····	夏子贤(106)
五十年代玉溪卷烟厂·····	杨序佰 张峻君(108)
解放前玉溪第一批机械工人的成长 ·····	冯联魁等供稿 辛也乐整理(116)
玉溪邮电事业发展简史·····	王元忠(122)
云南省首创有声电影院及溜冰场之回忆 ·····	郭健民供稿 文 孜整理(131)
玉溪人民电影院·····	陈 铭(137)
玉溪州学的演变与发展·····	张崇有(144)
玉屏彝族乡办学简史·····	李碧荣(160)
新民幼稚园创办始末·····	冯秀华(162)
解放前玉溪州城中西医概况·····	邓士贤(169)
玉溪专区人民医院建院前后·····	段东升口述 冯则恭整理(176)
潘凤鸣轿行及玉溪民间婚丧习俗(上)·····	潘发义(184)
行会浅述·····	普光谦(198)
全蜀旅滇同乡会大营街分会·····	陈德禄(201)
前昆玉河通曙守备司令官张效巡启事·····	柴信忠供稿 王德菴辑注(206)
“飞贼”李竹溪落网记·····	马恩亮口述 明辉南整理(210)
玉溪市部分戏曲石雕·····	马云龙撰文 许克智拓片(219)

新兴州尊经阁·····	李继星(225)
后裕乡观音寺及耆英会的由来·····	尹家伟(227)
玉溪南藩——凤凰山·····	张士禄(229)
大觉寺·····	陈德禄(232)
上坝古桥·····	石廷献(235)
把者岱“迎龙桥”碑记·····	石廷献(237)

怀念郑一斋先生

聂叙伦

郑一斋先生是云南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早年是一位小学教师，后因生活所迫，弃学经商。由于他精明强干，业务发展很快，没有几年就跃入我省民族工商业者的行列。他虽然富有，但生活却很俭朴，他喜欢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鲁迅的著作，不断追求真理与光明。他痛感国家民族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眼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一片片，被列强吞没，他亟欲寻求救国之道，忧心忡忡，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早日获得成功！因此，他拥护党领导的民族民主斗争，积极支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他虽然已经逝世四十七周年了，但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一）

郑一斋先生1891年9月16日出生在玉溪县州城。取名“重毅”，字“一斋”。他的祖辈是江南望族，明朝时移民到云南定居的。父亲郑宝臣，为人忠厚勤劳，在州城开设了“宝臣号”商店，经营土杂日用物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宝臣先生有子女9人，一斋排行第二。因家庭人口

多，商店收益除生活费用外，所余无几。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不许抽烟、酗酒、赌博和收取不义之财。长子早卒，三子、五子随他从事商店业务，其余子女都先后送到私塾或学校念书，一斋先生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能诗能文，对古代文学有造诣，为国学家李厚安先生的得意门生。

一九〇八年，在父母的主持下，一斋先生与速氏兰田结婚，婚后一年得子。他感到自己已成了家，还未立业，仍要家庭负担一切生活费用，心中不安。决定努力攻读，自奔前程！于一九一〇年与四弟洁斋，同往昆明求师。这时，正好有一个奇特的和尚，自称万慧法师，通晓英、法、藏、缅几种语言文字，学识渊博，离开佛地到一些学术机关讲授佛经。一斋先生弟兄慕名前去听讲，对他的才华深为敬佩。多次拜访，请求收为弟子，传授佛经和外语。万慧法师看到他们弟兄聪明诚实，有培养前途，同意建立师生关系。从此，弟兄俩每天和其他青年十余人一起去听课。课堂纪律非常严格，不得无故请假或迟到早退，课后要按时交阅作业，因而学生的进步都很大。一天，法师提出要去缅甸研究佛经的意见，不少人表示愿意随往，一斋兄弟更是高兴万分！隐瞒着家庭，随同法师和其他青年西行。途经大理时，被清朝官吏发现，经盘问后，责令随行青年，一律返回昆明，只允万慧法师一人翻越高黎贡山入缅。

一九一三年，“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招生。因系公费，报考的学生相当踊跃，几乎超过招生人数的十倍。一斋

先生报考国文专修科，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在校学习期间，他刻苦攻读中国文学并研究中外历史，成绩优异。一九一五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昆明“劝学所”，兴学育人。为了做好宣传和劝导入学工作，一斋先生和其他老师一起，终日奔走呼号，费了很大气力，才按计划完成了招生任务。

在教学中，他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反对封建式的打骂教育，主张用说理教育的方法，启发学生的自觉性，主动学习。在假期中，经常带领学生到西山、筇竹寺、金殿、黑龙潭郊外旅游，有时开展爬山竞赛，有时围地谈心，有时下水游泳，有时集中在一起，对学生讲述一些动人的故事，如介绍伟大文学家托尔斯泰的生平事迹等，使学生们受到鼓舞和启发。并在游览名胜古迹中，讲述有关朝代的历史事实，揭发封建帝王的残暴统治，以增加学生的历史知识，并启发他们的爱国爱民思想，许多学生得到健康成长，成为社会上有用之才。有的还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斋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人诚恳、坦率，教学认真负责，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深受学校师生和家长的爱戴。他虽以“兴学育才”作己任，但由于当时小学教师的待遇非常菲薄，每月所得报酬，无法维持全家的生活，不得不弃学经商。他离校时，老师和学生们都为学校失去一位良师挚友感到惋惜，他对师生们坚决表示，虽然他离开学校，但对教育事业，仍将一如既往，为兴学育才贡献他的力量。

(二)

郑一斋先生在亲友的支持下，借到一笔资金，在昆明市三市街（现正义路南段）开设了“景明号”商店，以经营纸烟为主要业务。由于他讲求信誉，经营有方，业务蒸蒸日上。不久，即由零售发展到批发。他所经营销售的“红锡包”、“联珠烟”、“刀牌烟”等名牌香烟，畅销全省各地。深得厂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原名“英美烟草公司”）的赞扬和信任，分别委托“景明号”为云南省推销该公司几种产品的总经销商号，并得优惠待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销后付款，不仅不需要占用大量资金，还可以利用未到期的应付货款，作短期周转。销路逐渐扩大，终于成为昆明市经营纸烟业务的一家大户。当时，由于昆明市纺织工业缺乏染料，须由国外进口。郑一斋先生又与美商“南星颜料公司”取得联系，双方达成协议，由“景明号”承担“南星颜料公司”在云南的颜料总经销，染料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业务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便于对外联系，“景明号”还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一斋先生的七弟郑雨笙（现名郑易里）担任经理。此后，业务更加活跃了。

在经营管理方面，一斋先生也是一位能手，他重视市场调查了解，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购销业务，很少出现商品积压，占用资金，或脱销的情况。企业内部管理井井有条，由于财务会计制度比较健全，资产负债状况比较清

楚，各项债权债务能及时处理，保证了企业资金合理应用。对职工的福利待遇也关怀备至，职工有困难，他都尽力帮助解决。在企业经营中，他能以身作则，受到人们的尊重与爱戴。他一直认为：保持信誉，取信于人，是企业的生命。“景明号”业务得到发展，保持信誉，是一个重要因素。

郑一斋先生致富后，生活仍然非常俭朴。他有子女十一人，六男五女。在生活作风上，不许他们沾染一点富家子女的不良习气。在校学习的子女，要向他汇报学习情况，他也尽量抽出时间来，给子女们辅导。他常对人说：

“我做生意，完全是为生活，不是为了发财享受。既有了钱就要会用，要用在‘振兴实业’、‘兴学育才’上，用在社会福利事业上，绝不能做钱的奴隶。‘钱’用之得当，就发挥有益的作用，用之不当，就会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成为罪恶之源。”

由于他的经营有了很大发展，引起了当时官僚资本者的嫉妒和眼红，对他经销的香烟和颜料，采取了“专卖”的手段，由官方垄断，并课以重税，使后来的经营，受到严重挫折。

郑一斋先生是我的岳父。一九三二年我和他的大女儿郑琼结婚。婚后，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他是一位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学识渊博，非常健谈的人。他经常鼓励我，要我看清形势，为革命事业作出努力。先后赠送给我的进步书刊，就有七、八十本之多，其中有《资本论》和鲁迅的著作。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尚的道德品质，给我很

大感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启发下，使我开始认识到真正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为社会事业作出贡献。

读书是郑一斋先生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每天上午他几乎都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读书，不许人去干扰他。旅游活动也是他的一种爱好。他跑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东到普陀山，南登雁荡山，西至匡庐山，北出山海关。每到一处，他总是不避艰险地往山上爬，不到山顶，绝不罢休。这也是他的性格倔强的特征。

(三)

郑一斋先生一贯同情革命，支持进步。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帮助，在支持文教事业，兴学育才和振兴实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仅就我和他的接触中，耳闻目睹的部份事实，回顾如下：

一、支持革命，同情进步人士

一九三一年，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昆明，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中共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时，中共中央派李鼎三同志来滇任中共云南省委秘书长，代行书记职务，并兼少共书记和中国红色救济总会云南省分会主任，恢复被破坏后的云南党的工作。李鼎三同志是刚由莫斯科劳动大学毕业回到上海的。

受命以后，他向老友郑雨笙先生了解云南的情况，得知他的二哥郑一斋先生是一位进步的爱国的工商业者。李鼎三同志决定把郑作为团结的对象和统战工作的依靠力量。并由郑雨笙先生致函一斋先生暗示对李鼎三同志给予支持。

不久，李鼎三同志和刘靖予同志（化名为柳浪石）一起，由上海取道香港、海防、河口到滇。行前，曾与刘林元同志约定路上的联络方法和暗号。刘先行，李、柳随后登程。不料，李、柳到达河口进入滇境时，由于叛徒出卖，竟被武装军警在旅舍中逮捕，押送到河口督办公署，带上手铐脚镣，又押解昆明市警察局里。经过审讯，李鼎三同志感到有被杀害的危险！设法疏通了一个看守监狱的士兵，写了一张字条，秘密地转送给一斋先生，请他设法营救，盼郑立即把被捕的消息，通知李在苏州的姐夫朱世贵（朱虞良）和在南京的堂兄李南屏。朱世贵是当时南京伪参议院中将参议，曾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八师师长，为李根源先生的学生，在苏州他们是住在两邻。李南屏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担任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委员，他与朱培德有交情。朱、李在接到郑一斋先生的紧急消息后，立即分别找到了李根源和朱培德，请求营救。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打了电报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要求释放李鼎三和柳浪石。龙云收到电报后，随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昆明市市长李亚夫。内容大意是：“要犯李鼎三、柳浪石一案免于追究。”因此，案情得到缓和，经过再次审讯，当场判决宣布：“要犯李鼎三、柳浪石着处徒刑三月，发交模范监狱执行”。三月期满释放出狱后，李鼎三、柳浪石两

同志于一九三二年春离开昆明，步行到西康，经雅安到叙府（宜宾），再乘小轮到重庆，由重庆去上海，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能够脱险，是郑一斋先生冒着极大风险营救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昆明市市区经常遭到日机轰炸，郑一斋先生疏散在大观楼外的一个村子“明家地”居住。住宅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平房，位于滇池边上，屋外都是农田，周围挖沟，搭一短桥入门，看起来就象一座孤岛。乡村房屋相距在一、二里之外，更是显得孤零零的。城里的住家则在北门街北仓坡一号，即圆通山的后面。这两个地方都比较幽静，成为了掩护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集会的场所。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许多同志如唐用九、楚图南、冯素陶、李公朴、赵枫、黄洛峰等同志，都先后在北仓坡一号躲避过。在这期间，一斋先生还安排家人随时用望远镜观察外面的动静，以保地下党同志的安全。

为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交换对时事政治的意见，以及商讨如何推动云南抗日民主运动的问题等，经一斋先生和孙起孟等同志的发起，以聚餐会的形式为掩护，每两周集会一次，地点就在一斋先生的家里，由一斋先生做东道主。由于最初聚会的是九人，所以称为《九老会》，实际上每次都有临时邀请参加的，不止九人。先后参加过的，有楚图南、张冲、李公朴、孙起孟、周禾书、冯素陶、艾至诚、张天放、杨春洲、杨一波、赵枫……。我也临时参加作陪过几次。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国民党两次反

共高潮的冲击下，活动是很困难的。有的进步组织被分化瓦解了，许多进步人士处在困境中，通过聚餐会的活动，在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郑一斋先生对统一战线的工作也非常关注。如在抗日战争初期，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前后，朱德委员长密派周素园先生，从延安来昆明与龙云联系，一斋先生得知后，曾亲自走访了周老先生，邀请他在大观楼的“楼外楼餐厅”进餐。邀请了一些民主人士作陪。席间，周先生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大家很受鼓舞。对云南的政治形势也作了认真的分析，从而加深了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

一九四二年，日军进攻缅甸，即将在仰光口岸登陆。缅甸局势，万分紧张！许多侨居缅甸的革命人士，已纷纷撤离仰光归国。还有一些同志，由于缺乏旅费，滞留腊戍，无法启程入滇。一斋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焦虑！立即和李公朴先生商量，愿以滇币五万元资助他们。李公朴先生也毅然应允亲往缅甸腊戍，办理此事，帮助他们迅速离开缅境，以保安全。当时我任云南兴文银行仰光办事处经理，正加紧处理银行的撤退工作，除留下职工一人陪我留守仰光外，已全部疏散回家。在形势危急，日机轰炸声中，我才离开仰光，亲自驾车来到腊戍，帮助兴文银行腊戍办事处做好撤退的准备。这时，正好李公朴先生来腊戍办事处领取汇款，和我相遇，交我一封一斋先生的介绍信。信的大意是：李公朴先生是他的好友，希望我热情地接待他，帮助他解决好滞留腊戍一些朋友的回国问

题，并安排好李公朴先生返回昆明的交通工具等。所有这些，我都一一照办了。李公朴先生也告诉我，他是受一斋先生之托，前来资助一些滞留腊戍的朋友。在他的奔走努力和我们的协助下，很快就和这些人联系上了，妥善地完成了资助返回昆明的工作。这时，缅甸时局更加紧张了，社会秩序相当混乱！为了保证李公朴先生的旅途安全，我请他乘坐兴文银行的疏散汽车和我一起经畹町入国境，顺利地回到昆明。一斋先生看到我们平安归来，十分高兴！特别是那些滞留腊戍的朋友陆续回国，和他见了面，更是感到欣慰。

唐用九先生早年曾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是一斋先生的老同乡。他们友谊很深，过从甚密，情同手足。唐对郑的进步活动是非常敬佩和赞赏的。有时，一些同志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困难，只要他向郑说明情况后，都得到郑的帮助和解决。一九三六年，由于红军急需云南白药，救治伤员。唐告知郑这一情况后，郑立即购买了一批曲焕章的白药和“日月大药房”出产的百宝丹，由唐出面转交捐赠。

二、兴学育才，支持文教事业

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为了振兴中华，传播革命思想，筹集资金，开设了“生活书店”，经销各种进步书刊，深受读者欢迎，业务蒸蒸日上，闻名全国。这就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蓄意强迫“生活书店”关门，但

没有得逞。一九三六年“救国七君子”被捕入狱后，国民党竟称“生活书店”与“七君子”有关，施加压力，迫使“生活书店”不得不停止营业，另行改组成立“读书生活出版社”。但因缺乏资金，无法开展业务。雨笙先生请求其兄给予支援，一斋先生立即汇款几千元大洋，解决当时的资金困难，使企业能继续维持下去，并对改组后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投入了一大笔资金。出版社由中共党员黄洛丰同志担任经理，艾思奇同志担任编辑，郑雨笙负责财会工作。它所出版的《资本论》、《大众哲学》和其他进步书刊，对宣传革命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公朴先生从缅甸回到昆明后，一家五口人定居在北门街。当时，由于货币不断贬值，物价节节上涨，他又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处境十分艰难。一斋先生按月供给他生活费。李公朴先生心里感到很不安，他向一斋先生提出：打算在他住宅楼下的临街铺面，开设一间小书店。他认为距各大专院校较近，是一个文化中心，出售进步书刊，一定有发展前途。对经济生活也不无小补。要求一斋先生提供书店资金。一斋先生表示大力支持，于是开设了“北门书屋”，销售各种进步书刊，翻印毛主席部份著作，这对宣传革命思想，联系群众，都起了好的作用。同时，李公朴先生的生活困难，也得到一定解决。

法籍教育家柏希文先生，是郑一斋先生最尊重的一位学者。他是有名的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学识渊博，精通法、英、德几国语言文字，也懂拉丁文和中文。一九一三年他应蔡松坡都督的邀请，来昆明工作。护国之役，曾为

蔡以法英德等国文字，草拟发往各国政府宣布云南独立，讨伐袁世凯窃国罪行的《通电》。后来一段时间，他经营过钨业公司，赚了一大笔钱，用来资助革命。他虽是法国人，因他的母亲是广东高州人，他又出生在广州，自认中国是他的祖国，广州是他的故乡，云南是他的老家。他热爱教育事业，看到当时昆明外语师资缺乏，学校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比较低。为了培养英语人才，他含辛茹苦地筹资兴学。在威远街的一所旧瓦房里，开办了“英语学会”，为各校师生课外补习英语。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培养了大量的学生，每年由庚子赔款拨支的两名香港大学公费留学生名额，几乎都是“英语学会”的学生考上的，学校名声大振。但由于学校收费低，贫苦学生还可以免交学费，因此，常常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希望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和捐助。郑一斋先生就是“英语学会”主要捐助者之一。在学校经费困难的时候，他都主动资助。记得有一个夜晚，因停电，教室要点用煤油气灯照明，但没有钱买油。一斋先生得知后，立即送来了一桶美孚牌水火油，不致因无油而停课。一斋先生对柏希文先生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的。柏希文先生生病时，他常常亲自去护理，送水送饭。或者护送到医院治疗，由他付医药费。后来柏希文先生因病逝世，所有安葬费用以及立碑修墓的钱，都是“景明号”拿出来的。

“云大附中”的学校经费非常困难，没有一本供师生阅读的图书，没有一件仪器，其它设备也陈旧破烂。一斋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捐赠了一万元，作为购买图书